2006 年第 5 期　　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Vol.31 No.5
第 31 卷(总第 131 期)　　Journal of Hebei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　　Oct., 2006

现当代文学研究

不同生命欲求之间的冲突

—重读《寒夜》

阎 浩 岗

（河北大学人文学院，河北 保定 071002）

摘　要：《寒夜》的内涵丰富复杂，超越了社会制度批判层面。它让“五四”以来的个性话语与人道话语平等对话，让不同价值观念为各自的合理性进行辩解，又对其各自的局限性予以展示。曾树生与丈夫及婆婆之间的矛盾，实质是不同生命欲求之间的冲突。叶绍钧开创的普通人日常生存状态小说，至《寒夜》达到一个高峰。

关键词：《寒夜》　悲剧内涵　生命欲求

作者简介：阎浩岗（1963—），男，河北吴桥人，河北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文学博士。

中图分类号：I26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378（2006）05-0109-05　　**收稿日期：**2006－04－15

《寒夜》是巴金最后一部长篇，也是他最优秀的一部。说它最优秀，并非意味着它比《家》影响更大，而是因它用更成熟完美的艺术形式，表现了比作者任何其他作品更丰富、更复杂、更深刻的内涵，具有超越特定时空的永久魅力。《家》一类小说内容单纯，主题一目了然，对其内涵很容易形成共识，后来者难以挖掘出新的东西，而且，当封建家长制、等级制逐渐成为过去时，它除了历史认识价值，就所余无多了。《寒夜》则不然，现在的研究者仍可对其内涵进一步研究探讨、争论思考，普通读者也能不断从中受到新的启发。

一、丰富复杂的悲剧内涵

《寒夜》是一个悲剧，巴金自己称之为“好人的悲剧”。他一如既往地把罪恶根源归之于社会制度，认为：“要是换一个社会，换一个制度，他们会过得很好。使他们如此受苦的是那个不合理的旧社会制度。”[1]〈P696〉“罪在蒋介石和国民党反动政府，罪在当时的重庆和国统区的社会。”[2]〈P503〉似乎只要改变了社会制度就可一了百了，似乎在新社会里就不会出现这样的家庭悲剧。许多学者也认同于这种解释，认为这部长篇“愤怒地控诉了国民党的黑暗统治，揭示了这个反动政权及其所代表的社会制度必然崩溃的历史命运。”[3](P341)

无疑，汪文宣一家关系的恶化以及各自的悲剧命运，与当时的社会环境有密切关系。小说中主人公曾多次抱怨老实人、奉公守法者郁郁不得志，难以施展抱负、实现理想、得到幸福。但，我们若细究起来却发现，他们的抱怨并不针对某一具体政府或制度。他们都多次谈到“从前”的美好生活：汪文宣说：“从前我也常坐咖啡店。”曾树生说：“从前我们都不是这样过日子的”，“从前在上海的时候我们做梦也想不到会过今天这样的生活。”那么，他们指的“从前”是什么时候呢？书中交代得很明白，是“八九年前”。故事开始是 1944 年，结尾是抗战胜利的 1945 年，可以推算：所谓“八九年前”，应当是抗日战争爆发前的 30 年代中期。当时上海华界地区的政府就是国民党蒋介石政府，社会制度与 40 年代中期不会有本质区别。不同的只是战争——是战争夺去了他们以前比较好的环境和比较好的生活。当然，除了战争，汪文宣也诅咒“那些冠冕堂皇的门面话，还有街上到处张贴的告示”，可“那些冠冕堂皇的门面话”和“街上到处张贴的告示”此前就有，此后也还可能有。近年来，有的研究者在“社会悲剧”说之外，又提出了 “文化悲剧”说，主要着眼于汪母与树生所受的不同教育以及由此导致的不同文化观念、伦理观念。笔者认为，“社会悲剧”说与“文化悲剧”说分别揭示了《寒夜》悲剧内涵的不同侧面，但《寒夜》的悲剧内涵不是单一而是丰富复杂的。除了社会环境以及汪母和树生之间文化价值观念的差异乃至对立，汪文宣一家悲剧的根源，还在于他们自身的因素。我们还应分别从三位主要人物各自的人格结构、内在欲求与性格特点角度进行更细致的剖析。社会环境的恶化只是家庭矛盾激化的大背景和催化剂，人物不同的物质与精神欲求才是人物之间矛盾的直接原因。文化以及价值观念的差异，也必然表现为人物主观欲求的差异。

到目前为止，对于由汪母与树生各自成长的时代环境和所受教育的差异造成的她们价值观念的差异对立，以及由此

?1994-2017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导致的婆媳间几乎无休止的、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研究者比较关注，论述也较充分。而汪文宣与曾树生夫妻之间的矛盾被研究得则相对较少。这首先由于文宣一直处于对自己的压抑状态，树生对丈夫又一直怀有怜悯并常作一定妥协，甚至在提出离婚后还关心并资助他。书中提到的他们之间惟一的一次正面交锋，即导致小说开头所写树生出走的那次比较激烈的争吵，还被作者推到幕后，没作正面表现，没有交代他们具体讲了什么话。但，他们之间的矛盾是客观存在。文宣对妻子的不满虽未正面说出，我们却可从小说的字里行间分析出来。首先，作为一个丈夫、一个男人，他对自己的妻子在外面与别的男人比较密切的交往决不会不在乎，妻子充满活力和魅力的健康肉体，既引他爱慕，又使衰化了的他嫉妒并为此感到痛苦。其次，他希望妻子对母亲多忍让，妻子去兰州后他甚至妄想她能给母亲写道歉信；树生虽在婆婆挖苦辱骂自己时有所克制，在给文宣的信中也表示出对婆婆一定程度的理解，但她并未完全如丈夫所愿，文宣肯定对此也不满。当无法解脱时，他曾偶尔暗自埋怨："没有人真正关心到我，各人只顾自己。谁都不肯让步！"第三，对妻子远走兰州，他虽表示理解，内心最深处其实并不情愿，可最终她还是走了，后来又提出离婚；他虽未指责树生，此事对他的伤害却几乎是致命的。另外，他对树生与儿子之间的淡漠关系在内心也偶尔涌出一丝不满："她并不关心小宣，小宣也不关心她。"树生对文宣的不满，则是直接表露：她不只一次地指责他懦弱，抱怨他过于忍耐，冲动下甚至当面对文宣说，自己当初与他的结合是"瞎了眼睛"。

要理解他们夫妻间矛盾的实质，首先应了解他们各自不同的内心欲求，他们不同的人生态度。在上大学时以及他们婚姻生活的初期，即战前，他们的差异与矛盾尚未浮上表层。但笔者以为，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夫妻间的差异以及树生与婆婆的矛盾是战争爆发后才产生的。我特别注意到文本所留下的一个不小的叙述空白：作者始终没有交代从小宣出生到战争爆发他们流落到重庆之前，他们的工作与家庭状况。故事开始时，作者交代，文宣与树生都是三十四岁，小宣十三岁。可以推算出，小宣出生于 1931 或 1932 年。从 1931 或 1932 到 1937 这五六年时间，他们一家生活在上海，过着可以经常坐咖啡店、经常去电影院娱乐消遣，汪母也不用自己洗衣服的日子。那么，他们是凭什么经济来源维持这样的生活呢？他们肯定没有失业（在战时的异乡尚且能找到工作）。文宣与树生大学毕业后各自的职业究竟是什么？对此小说未作交代。文宣曾对树生提到："那个时候我们脑子里满是理想，我们的教育事业，我们的乡村化、家庭化的学堂。"估计他们是一起从事教育；事业进展虽然未必完全如愿，起码理想没有破灭。不过，即使在这个时候，汪母对儿媳也不会有多少好感，因为小说中她总以树生没有与儿子举行正式婚礼为把柄辱骂儿媳是"姘头"，她肯定一直看不惯、看不起儿媳的生活作风、生活态度；树生与小宣母子感情不深，她忽略儿子的存在，估计也并非始自到重庆以后。她是较早受现代教育——西式教育的城市女子，把作为独立个体的自我的价值看得重于自己在家庭中作为妻子和母亲、儿媳的伦理角色的价值。她的变化是，战前在年轻而物质条件又较好的情况下更重视自我精神理想的追求，战时她逐渐进入中年，物质环境恶化，因而不得不忍痛放弃纯属精神理想的东西，转而竭力抓住"青春最后的时刻"，抓住物质享受和精神自由，抓住光和热，因为她"怕黑暗，怕冷静，怕寂寞"。过去把她和汪文宣连接在一起的是他们共同的理想，以及文宣的活力，可到了战时的重庆，文宣也被迫放弃了理想的追求，且复失去了生命的活力，懦弱敷衍的一面充分暴露出来。与妻子不同，他没有太多的物质精神欲望，能够忍受单调寂寞、没有活力的生活，这一点倒是与其母相像。

许多论者指责曾树生的出走，这是无视或忽略了不同生命个体在生命欲求以及精神忍痛与承重能力方面的差异。生理上忍痛与承重能力的个体差异容易得到理解，精神上的这种差异却常常被忽略。事实上，对于文宣与汪母来说尚能忍受的，树生却难以承受；另一方面，汪母可以忍受做"二等老妈子"，却不能忍受儿媳的存在、忍受儿子对儿媳的爱。这些差异的形成，有后天教育与环境影响的原因，也有个体先天素质的因素，还与每个人的具体现实条件分不开：树生尚未显老，生命力还很旺盛；她能生活得较好，除身体外貌的资本，也因适应环境的个人能力强于文宣。这些条件使她对生活抱有更积极更进取的态度，无法忍受寂寞、冷清、单调，无法忍受与满含敌意的人密切相处的痛苦生活。文宣处境的艰难当然主要因为战争环境以及人际关系的冷漠，但他自己的性格与处世态度也是重要因素。他怯懦软弱，没有男子汉的冲劲与魄力，思想多于行动，忍耐力强于意志力。他在心里多次替自己辩解，认为自己不比周主任之流以及那些翻译文稿的作者差，可除了个人道德品格上的不害人、富于同情心与忍让精神，除了文字功夫方面不写不通的句子，他并未表现出其他的个人能力。他自己也很清楚，他已经没有任何吸引妻子的地方；除了乞求怜悯、施舍，他又能做什么呢？他失去树生，还因他对妻子的爱不及对母亲的爱。当母亲不只一次得意而残忍地骂树生是儿子的"姘头"时，他甚至没有站出来说明，是自己主动反对举行结婚仪式的，更不曾公正而坚决地在母亲面前指出她观念的保守和她对儿媳态度的偏狭顽固，坚决制止母亲的主动挑起争端。在小说所表现的汪文宣与曾树生的夫妻现实关系中，树生基本是一个付出者，文宣则完全是一个索取者。假如树生坚持下来不远走兰州，也许文宣不会死得那么早；那么，她就会成为一个完全放弃

?1994-2017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个人利益、为别人牺牲自己的圣徒。可是，《寒夜》里只有普通人！文宣的忍让并非主动牺牲（即本来有过更好生活的可能而主动放弃的牺牲），汪母的牺牲则是出于母爱本能以及现实需要的不得已选择。假使树生不走，社会环境改善，文宣有了比树生更多的足可养家的经济收入，汪母逼儿子休弃儿媳、重演“钗头凤”悲剧的可能性，也并非不存在。

二、人道话语与个性话语的平等对话

已有学者指出了《寒夜》的复调性。不论作者本人理性自觉意图如何，笔者认为，这部作品内含意蕴中比较突出的是个性话语与利他型人道主义话语之间的对话。广义人道主义，即人本主义或人文主义，包括个性主义与狭义人道主义（利他型人道主义）两大类型。“五四”以来的中国现代文学中，既有表现并同情劳工大众“血与泪”的利他型人道主义小说，又有郁达夫、庐隐、丁玲等创作的追寻个体生命独立价值的个性主义作品。巴金早期作品多属利他型，即，同情受苦受压抑者，赞美为别人而牺牲的革命者。产生于20年代中后期的“革命小说”以及后来主要体现阶级话语的“普罗文学”，也是提倡为他人而牺牲个人利益，与利他型人道主义有一致之处。巴金40年代的小说仍坚持对于小人物的悲悯，悲悯的对象从以前作品中那些受压抑迫害者，扩大到《秋》里的克明，再扩大到《憩园》中的杨梦痴这种在《家》一类作品中完全被否定的人物类型身上。《寒夜》无疑更充满作者对于小人物的悲悯。不过，《寒夜》中的悲悯又含有对于人物个体生命独特性的尊重。这主要体现在曾树生形象的塑造上。虽然作者一再声称对三个主要人物“全同情”，但经反复阅读文本，笔者感到，作者对于这三个人物的态度并不完全一致。其中，对汪母否定的成分较多一些。她代表着旧的（即封建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虽然作者没有像在《家》里那样把这种类型的人物当作反面形象，虽然作者揭示了她一生的寂寞与现状的无助，对其人穷志不短的气节持肯定态度，但在小说中我们看到，她总是家庭争端的发起者，她不能容忍与自己不同的生活方式，对儿媳刻薄甚至有些恶毒，对于儿子与儿媳关系的恶化竟暗中高兴。而对于曾树生，作者同情的成分更多些。研究者对她非议最多的是她离开患病的丈夫远走兰州，又提出离婚。但我们不应忽略，小说用了大量篇幅，多次详细描写她在走与不走问题上的矛盾，展示她激烈的内心冲突，揭示出她的不得已。

曾树生的内心矛盾，其实就是个性主义与利他型人道主义思想的矛盾。她并不乏对别人的同情、理解和怜悯，不论是对丈夫，还是对邻居张太太。即使对充满敌意的婆婆，她也并不恨她；想到“她也在吃苦啊”，“她的生活比我苦过若干倍”，树生对于婆婆的进攻基本持忍让克制态度。但她毕竟不同于汪文宣，尽管她也曾扪心自问为什么不能牺牲自己，并多次为此而自责。如果利他原则至上，让对丈夫的怜悯与对儿子的责任占据首要位置，她就应选择不走；如果自我价值至上，即把个人幸福放在首位，她就必须选择走。在树生的内心斗争中，后者最终占据了上风。其原因，除了婆婆的态度让她绝望，丈夫的缺乏丈夫气、缺乏生命力使她既怜悯又厌恶，还有就是她认为即使她不走、即使她牺牲了自己的幸福，对丈夫也不单不会有太大帮助，还会继续互相折磨、互相损害。况且，如她自己所言，她还年轻，生命力还很旺盛，她爱动，爱热闹，需要过热情的生活，不能忍受刻板单调寂寞冷清的日子。她也曾试图做一个贤妻良母，但最终无法做到。所以，如果不带意识形态偏见，读罢《寒夜》，读者会像作者一样，会对她理解，对她同情。

这并不意味着汪文宣和汪母不令人同情。汪文宣是作品中最富于自我牺牲和利他精神的人。像《激流》里的觉新一样，他总是自己忍辱负重，是个“作揖主义”者。这种利他达到极点，甚至使他压抑下自己的醋意，赞同妻子和别的男人出走。与觉新不同的是，他对妻子和母亲的“作揖”不只因为怯懦，更出于理解和同情：他总能站在别人角度想问题，总能替母亲与妻子着想。见了门口在寒夜中露宿街头的流浪儿，他想“让他们到他的屋子里去，他又想脱下自己的棉衣盖在他们的身上”。假如汪文宣对他人的同情、为他人的牺牲是主动的，假如他不怯懦软弱而敢做敢为、勇于行动，那他就不再是普通人，而成为冉阿让式的英雄了。可他还是普通人。他的忍让与自我牺牲没有给妻子和母亲带来任何好处，对于那两个流浪儿最终“他什么也没做”。尽管作者对于汪文宣寄予了更大同情，但对他的丧失生命活力、放弃个性追求，一味忍让与自我牺牲，作者虽不像对觉新那样批判多于同情，却也并非赞美肯定。

所以，在这部小说中，利他型人道主义话语与个性主义话语之间，并没有哪一方占据绝对优势，它们之间是平等对话的关系。所以，尽管巴金自己对于创作意图表白为“控诉制度”，但文本本身实际并没有一个简单明确的结论。《寒夜》有别于作者其他作品的丰富复杂的内涵，有待于研究者们不断开掘，不断发现，不断讨论。

这部作品并没有放弃作者一贯的对封建意识的批判、对人道主义的呼吁。虽然我们可以从中发现作者对汪母这类旧阵营人物的人道主义同情悲悯，作者仍把她看做“好人”，写她的吃苦耐劳，写她对儿孙的慈爱，但我们又能感到，作者对汪母的封建意识残余是否定的。她是一个既未表现出人道主义的广泛宽容和悲悯，又缺乏现代个性意识的受害、害人又害己的人物。她的受害，是受环境、受战争之害；她的“害人”——从精神上伤害儿媳与儿子，是一种不自觉的伤害

?1994-2017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虽然得知儿子因患肺病受到同事歧视时，她愤激地说过："要是我，我就叫他们都染到这个病。要苦，大家一齐苦。"）；说她"害己"，是因她对儿子与儿媳的分手、对汪家的分崩离析负有重要责任。《寒夜》的深刻，就在于它在坚持巴金作品一贯主题的基础上，让"五四"以来个性主义与人道主义两种价值准则之间持续对话，让不同价值观念为各自的合理性进行辩解，又对其各自的局限性予以展示。

三、鲜明独特的艺术个性

不论在整个中国现代小说史上，还是在巴金自己的所有作品中，《寒夜》都是非常独特的一部。

除了巴金的《寒夜》，同样出现于40年代的钱钟书的《围城》和张爱玲的《传奇》也以普通人日常生活状态为对象。关注"大时代"的小人物，这是他们的共同点。不论是钱钟书笔下的方鸿渐，还是张爱玲笔下的大多数沪港男女，都是胸无大志、在命运面前被动敷衍的"不彻底"的庸人。《寒夜》中的汪文宣其实也属于这类人物。巴金说他"只希望自己能够无病无灾、简简单单地活下去"。[2]（P500）

但是，作者价值观念、生活态度以及由此决定的创作宗旨、情感倾向的差异，使得三位作家类似题材的作品呈现出各不相同的特色，显示出其鲜明个性。钱钟书固然对于方鸿渐不无同情，但《围城》给人印象最深的是，作者站在远远高于人物的观察点上审视众生，他对除唐晓芙之外的几乎所有人物都进行了讽刺挖苦，连轮船上孙太太孩子的长相、旅社老板娘哺乳的姿态都不放过。他的讽刺笔触主要针对人物的虚荣和平庸。钱钟书对于人物的这种态度，是由于他远远高于普通人的知识水平与人生境界，以及由个人秉性导致的与社会特别是下层社会普通人的相对远离。钱钟书也并非没有悲悯，但他的悲悯是上帝对自己创造的芸芸众生的悲悯，是感到人类既可怜又可笑的一种具有形而上色彩的悲悯。张爱玲有所不同：她对于自己笔下芸芸众生的基本态度是理解的同情，包括对于近乎疯狂变态的曹七巧。以往在评论张爱玲时，有人根据胡兰成以及其他一些人的回忆、根据她我行我素的个性及其小说叙事语调的客观冷静，判定她是个冷漠的没有同情心的人，说她"亦并不多愁善感。从来不悲天悯人"。[4](P451)但笔者以为，她并非一个真正冷漠的人，只是在人道主义与个性主义两者之间，她更偏重后者而已。她很熟悉巴金早期《灭亡》一类表现革命与爱情的小说，但她不热衷于革命等极端行为。她对于笔下人物的悲悯表现为理解并同情其平凡、平庸乃至庸俗的内心欲望和处世准则。张爱玲也是通过对于被社会忽略的边缘人物日常生存状态的展示以及对其内心世界的细腻描写，表现出她对于小人物的悲悯。就连坚持古典诗学观念的傅雷，也从张爱玲在对其小说中惟一较明显的否定性形象曹七巧的描写中感觉到了"作者深切的悲悯"，认为作者没有简单地谴责曹"自作自受"。当然，张爱玲自己并不等同于她笔下的人物，她本人在现实生活中是个进取者、成功者，但她对于自己的人物，却是站在接近于平视的稍高位置上，在理解和同情中微含讽喻。她并不怨天尤人、痛恨社会环境或具体制度。在感到"悲凉"、"苍凉"的同时，她似乎又对读者说："世界就是这样。我们只能抓住自己能抓住的东西，尽量让自己过得快乐。"

《寒夜》则不然。

从《灭亡》到《寒夜》，巴金的创作方法发生了很大变化。后来在谈到《灭亡》时，他说："所有这些人全是虚构的。我为了发泄自己的感情，倾吐自己的爱憎，编造了这样的几个人。"[5](P392)当时的读者、评论者也认为，杜大心"可以说是作者理想化了的人物，这种人物在现代的中国社会中是寻不出来的"。[6]为此，他的好友沈从文提出批评：

> 你看许多人皆觉得"平庸"，你自己其实就应当平庸一点。人活到世界上，所以成为伟大，他并不是同人类"离开"，实在是同人类"贴近"。你，书本上的人真影响了你，地面上身边的人影响你可太少了！……一堆好书一定增加过了你不少的力量，但它们却并不增加你多少对于活在这地面上四万万人欲望与挣扎的了解。

沈从文还劝他"把哀乐爱憎看得清楚一些，能分析它，也能节制它"，"能够从各个观点去解释"。[7](P223、221)巴金后来的创作果然逐渐向沈从文所指出的方向转变：在继续虚构革命与爱情传奇的同时，他写出了取材于自己最熟悉的生活的《家》，后来又创作了《春》和被夏志清誉为"中国现代长篇小说中的一部巨著"的《秋》。《激流》世界里已多是日常生活中常见的普通人，而在《火》以后，巴金更是有意识地去"发掘人心"，去写"小人小事"。虽然他还是表白自己的创作意图是批判制度、批判社会，但给人印象最深、使他取得更大成就的，却是"发掘人心"。这方面的顶峰便是《寒夜》。《寒夜》写的是作者周围每天都在发生的事，小说主人公身上有作者的朋友、亲戚或邻居的影子。写《寒夜》时，巴金虽仍充满

?1994-2017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激情，却已能“分析”人物的哀乐爱憎，能“从各个观点去解释”人的欲望和不同价值取向。

《寒夜》与《围城》或《传奇》的差异，首先就表现在其复调性，即“从各个观点去解释”人的欲望和不同价值取向。《围城》与《传奇》作者的视角基本是固定的，其观点虽未必清晰明朗，却也是确定的。《寒夜》的作者则分别站在汪文宣与曾树生两个人物的角度观察和思考问题，为他们各自代表的含有对立因素的价值取向进行辩解。偶尔还从汪母角度辩解几句。如果说汪文宣与《围城》和《传奇》里的人物在被动敷衍方面有些类似，那么曾树生却不是一个安于现状、被动敷衍的人。她始终没有放弃自己的个性、放弃摆脱不合理现状的努力。《寒夜》里大量出现的那种对于汪曾二人各自激烈的内心矛盾冲突的描写，在《围城》和《传奇》中也不多见。

《寒夜》的这一特色还是源于作者与人物同呼吸共命运的创作态度。对于人物深切的同情与悲悯，使得《寒夜》与钱钟书、张爱玲二人同以平庸的普通人为主人公的小说区别开来。在写《寒夜》时，巴金不是居高临下对人物进行讽刺，也不是冷静地表达“苍凉”之感。他说：“我进行写作的时候，好像常常听见一个声音在我耳边说：‘我要替那些小人物伸冤。’”“我虽然不赞成他们安分守己、忍辱苟安，可是我也因为自己眼看他们走向死亡无法帮助而感到痛苦。”[2](P501) “我写到汪文宣断气，我心里非常难过，我真想大叫几声，吐尽我满腹的怨愤。我写到曾树生孤零零地走在阴暗的街上，我真想拉住她，劝她不要再往前走，免得她有一天会掉进深渊里去。”[2](P503)

《寒夜》与《围城》、《传奇》同在 40 年代乃至整个中国现代小说史上最杰出作品之列，它们都具有超越时空的魅力。它们的不同风貌以及由此产生的不同审美效果使得它们相互不可代替：《围城》虽也能激发人的某种情感，却主要诉诸理性；虽在读后让人产生悲凉乃至虚无感，给读者最突出的印象却是幽默与机智。《传奇》将中国古典小说情调与现代意识结合，虽有终极悲观的感受，却又哀而不伤，怨而不怒。《寒夜》则在使人感受到灵魂战栗之余，又引发哲理思考，其思想内涵超越了作者自己原先设定的批判具体制度和否定具体政权的意图，艺术冲击力并不因故事发生年代的逐渐远去而消失。可以说，叶绍钧开创的普通人日常生存状态小说，到《寒夜》达到了一个高峰。

[参 考 文 献]

[1] 巴金. 创作回忆录[A]. 巴金全集第 20 卷[C].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

[2] 巴金. 谈《寒夜》[A]. 巴金全集第 20 卷[C].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

[3] 唐金海.“挖掘人物内心”的现实主义佳作[A]. 巴金作品评论集[C].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5.

[4] 于青. 张爱玲传略[A]. 张爱玲文集第 4 卷[C]. 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

[5] 巴金. 谈《灭亡》[A]. 巴金全集第 20 卷[C].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

[6] 知诸. 巴金的著译考察[A]. 上海：现代文学评论第 2 卷第 3 期第 3 卷第 1 期合刊[J].

[7] 沈从文.给某作家[A]. 沈从文全集第 17 卷[C]. 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

[8] 曾绍义.百年巴金的真实世界 [A]. 保定：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6）

［责任编辑 王会］

The Conflict Between Different Desires of Life

(Re-read *The Cold Night)*

YAN Hao-gang

(College of Humanities, Hebei University, Baoding 071002 China)

Abstract： The connotation of *The Cold Night* by Bajin is plentiful and complex which goes beyond the limits of the criticism to the social system. It makes a dialogue in the discourse of individuality and humanitarianism with each other equally, which also makes different ideas of value argue for their rationality, on the other hand, it reveals their limitations. The essence of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Zeng Shusheng and her husband and mother in law is the conflict between different desires of life. The type of fiction founded by Ye Shaojun reached its peak when *The Cold Night* was published.

Key words： *The Cold Night* ; the connotation of tragedy; the desires of life

?1994-2017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